

從遺忘到重新記憶

——評許維賢《重繪華語語系版圖：冷戰前後新馬華語電影的文化生產》

●詹閔旭

本書以冷戰前後的新馬華語電影為研究對象，透過新馬觀點重新介入和挑戰以北美學界為主導的華語語系研究之洞見與不見，積極與全球華語語系研究社群對話。



許維賢：《重繪華語語系版圖：冷戰前後新馬華語電影的文化生產》（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8）。

一 前言

華語語系研究是二十一世紀初的重要理論趨勢，備受美國、台

灣、香港、新馬等地學者關注。華語語系研究的聲勢大約在2010年代初期攀到最高，當時有不少研討會、期刊論文、論文集、專書掛上「華語語系」之名，以期回應這一波嶄新的研究趨勢。以筆者比較熟悉的台灣學界為例，不但有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史書美在台灣出版華語語系專書，《中國現代文學》、《中山人文學報》、《中外文學》、《台灣東南亞學刊》等台灣學術期刊相繼規劃專號^①，中山大學、東華大學、中央研究院等教研單位亦開設相關課程，舉辦演講、國際研討會。筆者也在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開設「華語語系文學專題」，曾和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授姜學豪跨國合授。上述種種不妨視為評估華語語系在台灣發展的各項「學術指標」，顯示華語語系研究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的活力與影響力^②。

華語語系論述看似蓬勃發展，但倘若實際細究各家論者觀點，不

少研究成果其實未能充分開展「華語語系」所隱含的理論潛力和思考脈動，頗為可惜。放在這一波理論史發展的脈絡來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專任副教授許維賢《重繪華語語系版圖：冷戰前後新馬華語電影的文化生產》（以下簡稱《重繪華語語系》，引用只註頁碼）這本專書可說是鶴立雞群。原因有二：首先，本書以冷戰前後的新馬華語電影為研究對象，透過新馬觀點重新介入和挑戰以北美學界為主導的華語語系研究之洞見與不見，此種清楚意識到論者發聲的位置、且積極與全球華語語系研究社群對話的做法其實相當罕見。其次，本書透過扎實的歷史考察與檔案整理，不但試圖勾勒冷戰前後新馬華語電影的文化生產，示範對早期新馬華語電影進行文本分析的具體操作，更避免流於理論先行的缺陷。總體而言，本書深化了「華語語系」這個概念的內涵，堪稱是當代華語語系研究不可錯過的重磅著作之一。

本文將分為三個部分，試圖梳理《重繪華語語系》的內容、重要性和隱含的理論議題。第一部分扼要整理全書結構與各章論述重點，並指出本書圍繞「雙重遺忘政治」展開論述。第二部分將深入探討許維賢提出的「遺忘政治」如何回應，甚至是修正目前華語語系論述所仰仗的「表述政治」。第三部分則從本書所隱含的第三世界主義立場，帶領讀者了解「重新記憶」南方觀點如何有益於全球華語語系研究的深化與多元化。筆者尤其希望指出，本書對於「記憶」、「遺忘」、「重新

記憶」、「知識生產」等概念的多層次闡述最值得讀者留意。

二 「雙重遺忘政治」

根據許維賢的說法，本書所定義的「新馬華語電影」是指「在新馬攝製發行並主要由本土演員主演的華語片與方言片，或熔合各種華語方言和外族語為一爐的本土影像包括劇情片和紀錄片」（頁1）。而在研究時間選段上，許維賢爬梳1927至1965年的早期新馬華語電影，希望探討冷戰前後的新馬社會變遷和電影文化生產之間的關係。何以早期新馬華語片值得關注？許維賢開宗明義解釋道，目前學界有關新馬電影史的專書多以馬來語電影和1990年代以後的電影為研究對象，不但鮮少提及早期新馬華語電影，即便提及亦存在不少材料和詮釋上的錯誤。為此，他希望透過本書「重寫備受國內外學界忽略的早期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華語電影文化，也填補世界電影史、亞洲電影史和東南亞電影史對早期新馬華語電影紀錄的空白」（頁2）。當讀者閱讀本書，隨處可見「遺忘」、「空白」、「忽略」等詞語，這既點出新馬華語電影的邊緣位置，也標示本書希冀「重新記憶」遭到遺忘的新馬電影文化，凸顯出本書的重要性。

不過，何以世界影史和華語影史忽略了距今不過半世紀之久的新馬華語電影？許維賢認為，這無法單純從新馬的地緣位置加以理解，反而涉及冷戰恐共氛圍下對華人性

當讀者閱讀本書，隨處可見「遺忘」、「空白」、「忽略」等詞語，這既點出新馬華語電影的邊緣位置，也標示本書希冀「重新記憶」遭到遺忘的新馬電影文化。

許維賢之所以考掘華語語系論述的1.0版本，目的恐怕不在駁斥史書美對當代華語語系論述理論化與推廣的貢獻，而是希望剖析一個更關鍵的問題：為何以馬來西亞為基地的初代華語語系論述竟遭到世人遺忘？

的壓抑與消抹，「在東南亞僅佔總人口百分之六的華僑被英美帝國視為威脅整個區域的少數族群」（頁2）。因此，本書更批判性地追問：何以冷戰前後的新馬華語電影遭到所謂的「雙重遺忘」——既遭到世界影史遺忘，亦在新馬人民記憶消失？何以世界影史無視新馬華語電影文化？甚至連新馬本地學者也逐漸遺忘新馬華語電影文化？是甚麼樣的歷史情勢發展讓新馬華語電影在當地人民記憶的版圖裏遭到抹去？華語電影遭到消音，是否和「冷戰以降以馬來文化作為霸權的國家中心主義」有關（頁1）？

《重繪華語語系》以「雙重遺忘政治」為研究起點展開論述。本書包括五篇主要章節，以及〈導論〉與〈餘論〉。〈導論〉除了梳理研究緣起、目的、重要性與章節架構，更值得一提的是，許維賢重新追溯華語語系論述的「版本升級」史，頗具參考價值。目前學界傾向把美國比較文學學者史書美2004年的論文〈全球的文學，認可的機制〉（“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視為華語語系論述的起點^③。許維賢肯定史書美的貢獻，但他同時指出，馬來西亞華人（馬華）學者陳慧樺（原名陳鵬翔）早在1993年已於馬來西亞提出「華語風」（Sinophone）的概念，探討區域華文文學與母體文學之間的辯證關係，許維賢主張這是華語語系論述的1.0版本；至於史書美的華語語系論述屬於2.0版本，而美國華文文學學者王德威的再修正則是3.0版本。對許維賢而言，他之所以考掘華語語系論述的1.0版

本，目的恐怕不在駁斥史書美對當代華語語系論述理論化與推廣的貢獻，而是希望剖析一個更關鍵的問題：為何以馬來西亞為基地的初代華語語系論述竟遭到世人遺忘？不只是「華語風」一詞，許維賢認為「華語電影」、「文化中國」這些說法皆始自新馬，但何以新馬研究者對於華人性、華人認同的豐碩成果卻輕易遭到以北美、中國大陸或台灣為主導的漢學研究一概忽略？

緊扣着「遺忘」這一概念，本書揭開一連串遭到遺忘的新馬華語電影文化。第一章「《新客》：從華語語系論新馬本土生產的首部電影」集中討論一部被遺忘的電影作品——劉貝錦出資並擔任編劇的《新客》（1927）。《新客》是新加坡本土的第一部電影，刻劃1920年代從中國南來的「新客」與土生華人之間的恩怨糾葛，展現不同華人群體的習俗、文化與價值觀。許維賢嘗試挪用華語語系研究的論述洞見，剖析這部電影如何展現新加坡早期結合華語方言和馬來語的「華夷風」，從而建構出南洋多元文化雜揉的華人性樣貌，但這部電影遭到馬來亞英殖民政府刪減、消除三分之一內容，最後因為電影票房成績不好，甚至被後世草率地判定為沒有上映。第二章「人民記憶、華人性與女性移民：以吳村的馬華電影為中心」選擇分析吳村在1940年代末期導演的三部馬華電影，探討影片裏所展示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走向反帝反殖歷史、走向本土化的新馬華人。

劉貝錦和吳村都是早期新馬華人電影工作者，但相關討論並不多

見。因此，第一和第二章不只重新發掘這兩位前輩業者的作品與特色，更關鍵的是，許維賢試圖追問：何以這些業者遭到忽視？何以馬華電影不存在於人民生活記憶裏？遭到壓抑的記憶為何和當代新馬種族政治息息相關？又是如何捲入全球冷戰的恐共浪潮？許維賢指出，《新客》被塵埋源於新馬在後殖民時期將華語和中國文化導向「華人沙文主義」的指控，致使新馬歷史知識生產話語慣性無視華人社會（頁37、34）。吳村電影的左翼背景與馬來亞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緊密聯繫，「可是1948年殖民政府頒布戒嚴法令，這些電影一夕之間成了禁片。而有關馬共〔馬來亞共產黨〕和勞動階級歷史的人民記憶，超過半個世紀至今依然是新馬官方歷史論述的禁忌」（頁72-73）。

前兩章討論早期新馬華人業者的作品，第三、四章則分別梳理馬來亞與新加坡在1950至60年代的反共電影。第三章「打造馬來亞：論英屬馬來亞製片組的冷戰影像」以馬來亞製片組（Malayan Film Unit, MFU）為研究對象。MFU是二戰後附屬於馬來亞英殖民政府資訊部門的影片組，製作了大量反共影像。許維賢深入論證MFU在冷戰時期所製作的影像除了包含反共使命之外，影片還隱含不容忽視的種族主義色彩，埋下新馬種族政治的禍端。第四章「新加坡故事，好萊塢版本：論冷戰時期美國政府在新馬製作的反共電影」則把關切轉向美國新聞處（USIS）的反共電影。1951年，USIS在世界各地動用當地人力贊助或製作反共電影，這

一章透過對兩部電影《小村烽火》（1953）和《星嘉坡故事》（1953）的分析，主張這一批反共電影往往採用好萊塢通俗劇手法，形成許維賢所謂的「冷戰東方主義」，「把新馬人民和共產黨員進行善與惡的二元對立」（頁113），那是一種美國透過文化生產和外交手段控制第三世界國家輿情的策略。

第五章「馬來亞化華語電影：論易水的電影實踐與第三世界電影」回到電影導演專論，集中討論馬華導演易水在1950年代以後執導的多部作品裏所反映的馬來亞化的華人認同，以期和華語語系研究對話。一方面，許維賢借重易水提出的「多種華語」、「馬來亞化華語電影」等主張，認為易水的觀點替日後的「華語電影」概念打下根基；「多種華語」讓華語的內涵得以和馬來亞獨特的語境混雜、交融，展現全新的華語語系化面貌。另一方面，許維賢也主張把「以寫實手法開拓劇情片」的易水電影（頁125），放在第三世界電影追求社會寫實、再現當地政經困境的脈絡中加以檢視，方能把握易水電影的貢獻與局限。

〈餘論〉統合上述章節的核心觀點。從1927年劉貝錦的《新客》到1950年代易水的多部作品，在許維賢的細膩論述梳理下，讀者可以發現冷戰前後新馬華語電影裏所蘊含的華人性歷經變遷。許維賢的觀察有二：第一，早期《新客》等新馬華語電影仍主要處理華人不同社群之間的磨合，但到了易水的作品，我們得以看見華語電影漸趨馬來亞化。第二，這些作品均隱含反

許維賢觀察到冷戰前後新馬華語電影裏所蘊含的華人性歷經變遷。第一，早期《新客》等電影仍主要處理華人不同社群之間的磨合，但到了易水的作品，可見華語電影漸趨馬來亞化。第二，這些作品均隱含反帝反殖的第三世界立場。

帝反殖的第三世界立場。從劉貝錦到後起的新馬電影導演如吳村、侯曜、尹海靈、易水，這一群華人業者成長於英殖民統治底下，殖民統治結束後復又捲入全球美蘇兩大政權夾殺的冷戰氛圍，從「失聲」到「附聲」，或許只能透過影像作品幽微地傳達第三世界的苦悶意識。

三 「遺忘政治」與「表述政治」

《重繪華語語系》不只透過扎實的史料考據，重新贖回早已遭遺忘的冷戰前後新馬電影文化，在理論辯證層面，其企圖心也不容低估。本書細膩分析早期新馬華語電影遭到「雙重遺忘」的困境，書中對於「遺忘政治」的多層次探索，有助於修正目前華語語系論述所仰仗的「表述政治」。

「表述」(articulation)是史書美的華語語系論述基調。「表述政治」的基本邏輯是：弱勢者受到政治、經濟、文化資本等多重決定結構的重重限制，導致弱勢者無法說話^④。如上所述，史書美2004年的論文〈全球的文學，認可的機制〉奠定了日後華語語系論述的起點，她在文章中探討弱勢文學如何能獲得全球認可機制的肯定，業已觸及弱勢文學如何自我表述、又如何能獲得桂冠加冕的策略。緊接着，2007年出版的《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更進一步把「表

述」一詞置入書名，藉此為一種弱勢的華語語系發聲，以此對抗大中華中心主義、離散華人論述、國家霸權與殖民政體的政治操作^⑤。與此同時，王德威發展以「後遺民」為基調的華語語系論述，儘管他強調須把中國納入華語語系文學範疇，看似與史書美的論述立場針鋒相對，但仍主張華語語系表述的獨特性有助於鬆動以中國漢人文學為主流價值品味依歸的霸權結構，流露出對國家文學的深刻反省^⑥。史書美和王德威的華語語系論述皆強調讓弱勢者自我表述的必要性。

然而，從本書所揭示的「遺忘政治」來看，「表述政治」的提法或許顯得過於簡化。例如，第一章從新加坡第一部本土電影的爭議切入這個議題。長久以來，印度裔導演拉傑漢斯(Balbir S. Rajhans)執導的《瘋子萊拉》(Laila Majnun, 1933)被尊崇為新加坡第一部本土電影，論者斥《新客》的存在為「謠言」，烏代(Jan Uhde)和黃筱菁的著作《潛影：新加坡電影》(Latent Images: Film in Singapore)便是一例(頁22-23、25)。為了推翻這樣的說法，本書藉由廣告、影評、觀眾的討論文章等各種證據，舉證華語電影《新客》才是新加坡本土第一部實際上映的電影。許維賢此舉不單純只是為了證明《新客》的歷史地位，更牽涉到以種族為運作邏輯的知識生產論：

這種否定不能等閒視之，因為這不但罔顧歷史事實，亦嚴重縮小此書〔《潛影》〕賦與早期華語片的書寫

「表述政治」的基本邏輯是：弱勢者受到政治、經濟、文化資本等多重決定結構的重重限制，無法說話。史書美和王德威的華語語系論述皆強調讓弱勢者自我表述的必要性。然而，從本書所揭示的「遺忘政治」來看，「表述政治」的提法或許顯得過於簡化。

幅度……或許馬來語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國語，新馬電影史的書寫者往往過度強調馬來片製作作為新馬電影史的起點，因此馬來片也成了新馬電影研究的中心。雖然新馬電影史，由數種語言片種所組成，但第一部電影是哪種語言片種，往往主導電影史對該語言片種書寫的比例和價值所賦予的合法篇幅和關注。(頁22)

這一段話點出新馬電影研究背後涉及的種族政治。選擇某一種語種(馬來語)進行分析，象徵選擇從某一種種族和文化立場(馬來人)理解一個國家的歷史發展。對許維賢而言，當研究者否定華語電影作為新馬電影的起點，隱喻了華語在新馬兩國的地位：儘管新馬兩國皆是多元種族國家，但馬來西亞的國語是馬來語，而華語雖是新加坡的官方語言之一，但新加坡國語仍是馬來語。因此，《新客》遭到遺忘實源自新馬的種族主義，源自冷戰時期新馬當地把華人與共產主義份子畫上等號的政治操作，而且在地種族政治近年來也和國際政治脈動掛鉤：「新馬的國族主義霸權在近二十年已和全球化之名的『普遍性的沙文主義』緊密聯手，從主流政界到主流學界繼續孤立、遮蔽、監控或打壓新馬那些捍衛『華人性』的華人。」(頁38)

從這個角度來看，《重繪華語語系》所提及的「遺忘政治」，恰好有助於挑戰弱勢者「表述政治」的正當性。如果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屬於弱勢國家，那麼是否只要在世界

影史中加入新馬電影就算是看見弱勢(新馬)文化了？許維賢的質疑是：誰能代表弱勢國家的電影文化進行表述？馬來語電影？華語電影？如果電影史作為一種影像史是自我認識的途徑，我們翻閱新馬電影史，是否能充分認識新馬文化？抑或只是單一語言、單一種族觀點的影像史？

除了質疑誰能代表新馬文化表述及具備正當性，許維賢進一步追問：弱勢的新馬華語文化是否具有充分認識自身文化的能力？弱勢文化是否也會遺忘自身歷史？這並非無的放矢。〈導論〉提到，來自新加坡的旅澳學者于樂(Audrey Yue)和邱素玲(Olivia Khoo)編選的論文集《華語語系電影》(*Sinophone Cinemas*)，忽略了早期新加坡當地所發展出來的華語電影觀，「這些來自新馬的原初記憶和歷史不但被中美和其他地區的學者排除在外，亦被來自新馬的學者自動消除」(頁8)。第二章批判來自馬來西亞的電影學者拉朱(Zakir H. Raju)、馬華電影導演陳翠梅等人對冷戰前後的馬華電影歷史渾然不知：「究竟是怎樣的後冷戰歷史條件、華人性的文化生產和國族主義導致這些屬於馬華的人民記憶，不但不被中國和新馬官方書寫的國族歷史記取的同時，亦被離散的馬華論述遺忘？」(頁52)易言之，「表述政治」通常強調來自邊緣的弱勢表述者如何與主流文化協商、對話或拮抗，但卻可能忽略了表述者並不必然具備相對應的知識基礎。表述者亦可能是遺忘者。

當研究者否定華語電影作為新馬電影的起點，隱喻了華語在新馬兩國的地位。《新客》遭到遺忘實源自新馬的種族主義，源自冷戰時期新馬當地把華人與共產主義份子畫上等號的政治操作。

四 「重新記憶」南方

《重繪華語語系》重新梳理冷戰前後的新馬華語電影，藉此讓遭到遺忘的新馬華語電影重見天日。不過，如同筆者前面指出，本書對於「遺忘」與「重新記憶」的思辨層次相當繁複，不只是為了讓早期新馬華語電影被看見，更深入探索「遺忘政治」的運作，主張新馬華語電影文化被遺忘的背後涉及新馬種族政治、華人性、共產主義、全球冷戰局勢等不同機制的交錯縱橫。換言之，本書隱含冷戰強權鬥爭下的第三世界主義立場，且把第三世界主義意識投影到新馬華語電影。筆者以下將以「重新記憶」南方作為論述切入點，思考許維賢的南方觀點如何有益於全球華語語系研究的深化與多元化。

本書嘗試繼承第三世界主義思想的血緣。我們從許維賢重新追溯華語語系研究的「版本升級」史，將陳慧樺的「華語風」一說視為華語語系論述的1.0版本，可見端倪：

1.0版本跟其餘兩個版本最大的不同在於對世界華文文學和反帝反殖的第三世界文學的認知和評價。……1.0版本的華語風全面見證和參與了大陸性的中文文化是如何在上幾個世紀來到南洋面臨本土化的進程，而這過程就不可避免涉及如何面對反帝反殖的第三世界歷史。2.0和3.0版本的華語語系論述比較傾向把「世界華文文學」進行問題化，更願意以現代化和全球化視角看待華語語系的各地歷史和其進程。（頁11）

這三個版本的華語語系論述，從截然不同的論述框架捕捉華語語系的各地歷史和其進程。陳慧樺、史書美和王德威三位學者的論述立場迥異，許維賢對這三個版本的詮釋有助於我們理解本書如何具體重繪華語語系版圖。

許維賢提到，「2.0和3.0版本的華語語系論述比較傾向把『世界華文文學』進行問題化」，這是很精準的觀察。2.0版本（史書美）提出「反離散」（against diaspora）作為華語語系論述的基石，質疑離散華人與華人性之間的必然關係，試圖挑戰長期主導漢學界和華人文學研究裏以離散作為價值的傾向；3.0版本（王德威）則奠基於「後遺民」論述，闡釋離散華人與原鄉中國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動態聯繫，強調兩者之間的藕斷絲連。但兩人其實都是從「世界華文文學」的框架進行延伸，重新思考中國文學/華人文學/華語語系文學的本質（頁10-12）。換言之，華語語系文學仍是以族裔研究為預設，透過該族裔與不同族裔的相逢和歷史境遇，企圖展現單一族裔內部的多樣性。不過，許維賢的論述立場則大異其趣：從〈導論〉尋覓新馬華語電影在世界影史的位置，第一、二章瞄準壟斷了新馬電影代表權的馬來語電影，試圖為劉貝錦和吳村等新馬華語導演發聲，一直到第四章批判美國透過文化外交手段控制第三世界輿情的「冷戰東方主義」，壓抑華人性與新馬華語電影的能見度，凡此種種，可見本書皆不以「世界華文文學」為預設對話對象，而是試圖連接全球冷戰研究、世

史書美和王德威都是從「世界華文文學」的框架進行延伸，華語語系文學仍是以族裔研究為預設；本書則不以「世界華文文學」為預設對話對象，而是試圖連接全球冷戰研究、世界影史研究、華語電影研究的論述成果。

界影史研究、華語電影研究的論述成果。

事實上，預設對話對象的調整，正是本書跳脫目前華語語系研究陷入族裔研究窠臼的途徑，落實重繪華語語系版圖的精神。華語語系研究發展至今已逾十年，勢必到達重新盤整研究方向的關鍵時刻。2019年成立的華語語系學會(Society of Sinophone Studies)整合文學、電影、歷史、人類學、語言學、藝術等不同領域學者，象徵華語語系研究的跨學科、跨領域、跨媒材轉向，可謂一例^⑦。本書讓華語語系研究重新銜接第三世界主義立場，則提供了另一條可行的方向，既能把世界華人研究放到更大的論述脈絡，也具體引入第三世界反帝反殖的歷史情境。

儘管本書以冷戰時期為研究對象，看似難以對應當代學術語境，不過其實回應了近幾年在國際人文與社會科學界備受矚目的全球南方研究(Global South Studies)，延伸了第三世界主義的關懷。隨着1980年《布蘭特報告》(Brandt Report)提出「南北」對立、1991年冷戰結束、2004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提出「形塑全球南方」(Forging a Global South)^⑧，學界紛紛使用「全球南方」取代「第三世界」一詞。「全球南方」作為一種概念，延續了以往第三世界、三大洲主義、後殖民論述的批判框架，把視野投向南方，甚至延伸至南方以外，試圖關注世界底層人民在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處境下遭到宰制的共通遭遇。如果說第三世界代表在冷戰時期的第三條革命道路，全球南方論述則

主張全球所有國家都不得不捲進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漩渦裏，難以脫身，也喪失了自主性^⑨。從這個角度來看，本書有意識地承繼第三世界主義立場，選擇分析南方華人電影文化遭到遺忘、抹煞、邊陲化的境遇，雖然可能沒有明確地呼應全球南方研究的意圖，但誠然幽微地呼應當代南方政治意識的崛起。

我們在近年的華語語系研究同樣窺見一種南方轉折。羅鵬(Carlos Rojas)的〈南方〔華語風〕文學的世界共和國〉(“A World Republic of Southern [Sinophone] Letters”)和黃錦樹的〈南方華文文學共和國：一個芻議〉皆嘗試摸索從南方觀點思考華語語系研究的可能性，點出南方作為一種思考位置的獨特性，也提請留意「重新記憶」南方的必要性^⑩。不過，上述兩篇論文所定義的「南方」皆是相對於中國的南方，仍「比較傾向把『世界華文文學』進行問題化」。相形之下，本書的南方觀點與第三世界主義思想接軌，誠然是目前全球華語語系研究相當罕見的嘗試，應可開闢更有別於以往的論述空間，值得讀者細細品味。

本書有意識地承繼了第三世界主義立場，選擇分析南方華人電影文化遭到遺忘、抹煞、邊陲化的境遇，雖然可能沒有明確地呼應全球南方研究的意圖，但誠然幽微地呼應當代南方政治意識的崛起。

註釋

① 台灣目前關於華語語系的期刊專號繁多，包括：「華語語系文學與文化」，《中國現代文學》，第22期(2012年12月)；「台灣與華語語系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第32期(2017年12月)；「華語語系文學論述」，《中山人文學報》，第35期(2013年7月)；「華語語系表述/馬華文學」，《中山人文學報》，第40期(2016年1月)；

「全球南方華文文學」，《中山人文學報》，第51期(2021年7月)；「華語與漢文」，《中外文學》，第44卷第1期(2015年3月)；「華語語系文學與文化的多面向觀察」，《台灣東南亞學刊》，第11卷第1期(2016年4月)。

② 關於華語語系研究在台灣的發展，參見張錦忠：〈華語語系文學：一個學科話語的播散與接受〉，《中國現代文學》，第22期，頁59-73；黃茂善：〈跨時空糾葛：華語語系研究在台灣小史〉(2020年12月30日)，*Taiwan Lit*，2020年第1卷第2期，www.taiwanlit.org/essays/跨時空糾葛-華語語系研究在台灣小史-2。

③ 史書美最早在這篇文章提到「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一詞，參見Shu-mei Shih, "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 *PMLA* 119, no. 1 (2004): 19, 25; 29, citation 5。值得一提的是，這篇文章也在同年被譯為中文，參見史書美著，紀大偉譯：〈全球的文學，認可的機制〉，《清華學報》，第34卷第1期(2004年6月)，頁1-30。「華語語系文學」被列為中譯版的關鍵詞。

④ 英文“articulation”一詞具有兩層意涵，分別為「表述」與「銜接」。根據陳榮強的觀察，史書美確實比較強調「表述」的必要，而非「銜接」所蘊含的基進性。參見陳榮強：〈華語語系研究：海外華人與離散華人研究之反思〉，《中國現代文學》，第22期，頁87。史書美的英文專著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被譯為《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或許是最直接的例證。此外，華語語系學會官方網站清楚說明學會成立的目的，在於思索能夠

提高弱勢社群能見度的方法學。該學會是目前唯一推廣華語語系研究的學術機構，可充分說明目前全球華語語系研究對於「表述政治」的重視。參見 Society of Sinophone Studies, "Anti-Racism Solidarity Statement", www.sinophonestudies.org/antiracism-solidarity-statement。

⑤ Shu-mei Shih, *Visuality and Identity*, 30-31.

⑥ 王德威：〈序言〉，載《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2015)，頁1-3。

⑦ 參見該學會網站的說明，www.sinophonestudies.org/mission。

⑧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 *North-South: A Programme for Survival—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 (London: Pan Books Ltd., 1980);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rging a Global South: United Nations Day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4).

⑨ 詹閱旭、吳家榮：〈「全球南方華文文學」專題導論〉，《中山人文學報》，第51期，頁2-5。

⑩ Carlos Rojas, "A World Republic of Southern [Sinophone] Letter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30, no. 1 (2018): 42-62 (原文標題“World”帶有刪除線)；黃錦樹：〈南方華文文學共和國：一個芻議〉，《中山人文學報》，第45期(2018年7月)，頁1-20。另可參見詹閱旭、吳家榮：〈「全球南方華文文學」專題導論〉，頁1-12。